

方纪生的事

《周作人先生的事》之编辑及其奉献给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生¹

川边比奈
鸟谷真由美

论文摘要：方纪生是一位为近代中日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的人物。他敬仰周作人，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交往。之后，直到周作人去世前夕，方和周一直保持着知心之交。1944 年时周作人正值花甲，方纪生为了庆祝他的 60 岁寿辰在日本出版了纪念文集《周作人先生的事》。该书在武者小路实笃的帮助下，汇集了 19 名与周交往的日本文学家等文化人的文章。然而如今，方纪生的存在将要被复杂交织的中日关系史的沟渠所完全埋没。他所注视的周作人是怎样一个人？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本文根据我和方纪生女儿川边比奈女士一起调查发掘的史料，对于至今几乎不曾被关注的方纪生进行分析，试图将方纪生的形象展示出来。

关键词：方纪生 周作人《周作人先生的事》新史料

此纪念文集献给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恩人周作人先生。

在先生六十寿辰之际谨以此文集表达我对先生的尊敬和感谢。

方纪生²

1 本文原題《方紀生のこと——《周作人先生のこと》編集と日中文化交流に捧げたその生涯》載于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会刊《野草》第 98 号“周作人特辑号”，2016 年 10 月。

2 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事》风光馆 1944 年，第 1 页。

缘起

鸟谷真由美



【照片1】1940年左右的方纪生

方纪生（1908-1983）是一位为近代中日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的人物。他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本名叫方念慈，笔名有为佳、月住、月华生等。他不仅和堀口大学、林芙美子、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等活跃在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日本作家，而且还和一些中国研究者也有亲密的交往。方纪生为这些日本知识人和祖国中国的知识人之间的交流，将他们与祖国中国的知识人连接在一起，为中日文化交流付出了巨大努力。方纪生在汇文中学时代曾师从周作人（1885-1967），并终生全心全意支持周作人。昭和19（1944）年时周作人正值花甲，方纪生为了庆祝他的60岁寿辰在日本出版了纪念文集《周作人先生的事》。该书在武者小路实笃的帮助之下，汇集了19名与周作人有交往的作家和中国研究者等文化人的文章。《编者序》里可以看到本文开篇引用的方纪生的献辞。在方纪生去世后三十多年的今天，他的名字作为《周作人先生的事》的编者似乎勉强为人所知，然而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完全不知其名的人绝非少数。在敌对和协作之间摇摆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狭缝中，没有光线照亮方纪生，他的存在正被完全埋没。

方纪生的一生，如晚年京都生活所象征的那样，总是与日本连在一起的。有过日本留学经验的方纪生拥有超凡的日语能力，且精通日本文化。另外，他因在中日两国拥有极广的人脉，才能把双方的人和文化连接在了一起。他的中日交流活动，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有两个，一个是他编辑的《周作人先生的事》，另一个是《骆驼草》影印本在日本的出版。前者前面已经提及，后者《骆驼草》是1930年代周作人和废名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以“自由发表意见，谈古论今，无所

顾忌”为主旨的文艺杂志。1980年代方纪生将自己收藏的《骆驼草》亲手送给了伊藤虎丸。之后，伊藤虎丸又加上木山英雄收藏的《骆驼》，合在一起作为《骆驼草》的影印本出版，即伊藤虎丸编《骆驼草 附骆驼》。关于上述经历，该书中伊藤虎丸的《〈骆驼〉及〈骆驼草〉影印缘起》一文有详细记述。该书主体部分的首页可以看到“方纪生”藏书印。如果没有方纪生，《周作人先生的事》和《骆驼草 附骆驼》这两本书今天将不可能存在。

由此来看，在方纪生的一生中，日本是不可分离的存在。然而，如果说正因为如此而导致方纪生的一生都在被命运捉弄，也实不为过。而且在方纪生死后，与日本的关系似乎也对他在现代中国的评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前面提到的《〈骆驼〉及〈骆驼草〉影印缘起》一文中，伊藤虎丸以介绍方纪生的简历作为对其厚意的感谢，其中有一处记述了下面一段话。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作为讲述日中关系史的一个侧面的资料，将此书记录保存下来。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作为战后长大的日本人，对于以战时对日合作为由被祖国问罪的一个中国人，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有着一一种可以说赎罪感一般的小小心意。³

本文选择介绍方纪生的理由与上面伊藤虎丸的这段话是一致的。我看到方纪生这个名字是在十年前，那时我在北京大学留学，研究题目选择了周作人。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偶然看到了《周作人先生的事》之后，我便对集结起日本文化



方宗鏊方、方宗鏊方、方宗鏊方、方宗鏊方、方宗鏊方(行役) 方宗鏊方
太太张瑞、方宗鏊方、方宗鏊方(行役)、方宗鏊方、方宗鏊方

【照片2】方宗鏊和家人(后排右一是方纪生)

3 伊藤虎丸《〈骆驼〉及〈骆驼草〉影印缘起》伊藤虎丸编《骆驼草 附骆驼》亚洲出版，1982年，13页。伊藤虎丸编《骆驼草 附骆驼》亚洲出版，1982年，13页。

人的编者方纪生产生了兴趣。然而，尽管我对方纪生做了大量调查，但除了了解到该书出版时方纪生“现任华北驻日留学生监督、前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⁴，以及他是《民俗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的作者之外，没有获得任何其他信息。另一方面在日本，伊藤虎丸曾根据方纪生本人的笔记介绍过其简历，据我所知，这是介绍方纪生最详细的文献。实际上有位名叫秀华的中国记者在1930年代曾写过“中日名人家庭访问记：方宗鳌先生的家庭”（《华文大阪每日新闻》1938年1卷第2期，文中附有方家一族的照片，*见照片2。照片不太清晰，前排中央是方宗鳌，后排右一是方纪生）一文，介绍了方宗鳌⁵和方纪生。不过，那时我尚未发现这一文献。可以说，关于方纪生，不仅在日本，在中国也没有什么讨论。

方纪生之所以没有受到关注，除了他与日本有密切的关系之外，他与周作人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鲁迅胞弟周作人在现代中国是作为“汉奸”而被忌讳的对象。当初方纪生敬仰周作人，从中学时期就开始交往。之后，直到周作人去世前夕，方纪生和周作人一直保持着知心之交。关于两人的关系，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1912-1997）在1983年6月接到方纪生去世的讣告后写给爱子（1914-2011）的信中有所表述，其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现在，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纪生应该被父母等亲人温馨地围绕着，亲切地交谈着吧。也许他还受到先父的迎接，一起喝着苦茶吧。⁶

日语文笔流畅的周丰一和方纪生在周作人在世时就是好友。方纪生曾回忆起1967年5月周作人去世时，丰一把他视为父亲最亲的弟子和挚友，将周作人生前爱用的两枚印章和砚台送给了他。砚台在方纪生最后来日本时被海关没收了，

4 参见《周作人先生的事》光风馆，1944，封皮内侧。

5 关于方宗鳌（1884-1950），请参阅本文川边女士的回忆。

6 周丰一致川边爱子的书简，1983年7月10日。

但两枚印章至今一直由方家珍藏。照片3即为那两枚印章，同样的印章在鲍耀明编的《周作人印谱》⁷一书中也有记载，而且还附有周作人亲手写的刻印信息。

关于前述《周作人先生的事》一书编辑的详细过程，因周作人和方纪生都不曾谈起而不为人所知，然而从最新发现的方纪生寄给周作人的书简可以看出，此书的编辑获得了周作人的全面合作。书简的详细内容将在第2-2节列举有关资料加以详述。方纪生一边和周作人商量，一边进行《周作人先生的事》的编辑，同时亲自写了《周先生的点点滴滴》一文。仅从此事也可看出方纪生和周作人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了。



【照片3】方纪生收藏的周作人印章

精通日语性格温和的方纪生所从事的中日交流活动，从战争时期的留学生支援开始，到日语书籍的翻译介绍、在东京大学担任中国文学讲座、《周作人先生的事》一书的编辑等，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方纪生的活动与日本以及周作人有着非同一般的缘分。

然而，日本的停战（中日战争的结束）却给方纪生的人生带来了巨大变化。方纪生从1940年8月作为“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驻在东京，1945年10月，他被美国占领军（联合国军）拘留在巢鸭拘留所，第二年被移送至南京，被判处“通敌叛国罪”，监禁4年。此间，爱子带着2岁的女儿斐娜，在战后极度混乱的东京拼命寻找自己生死不明的丈夫。1949年1月，方纪生和周作人同时获释出狱，然而在政治斗争不断激化的背景下，仍旧受到批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厄运突然袭来，方纪生与爱子一起被送进监狱（被打入大牢），被关押了长达7年的时间。当时的罪名是“里通外国分子”，其实那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概是卷入了政治斗争而被捕。在此期间，爱子认识了有日本留学经历的董竹君（1900-1997）。爱子晚年回忆起牢狱生活中与董竹君的相识时，说那是自己九十多年的人生中最

7 鲍耀明编的《周作人印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51页。

痛苦最难忘的经历⁸。方纪生夫妇于1975年7月被释放，而正式恢复名誉则是在4年后的1979年3月。

1980年4月，为了疗养和陪同妻子探亲，方纪生前往日本，这是他一生中第3次来到日本。竹内实从1955-6年开始与方保持了近30年的通信和书籍的交换，在他的协助下，方纪生作为“外国人招聘研究者”被京都大学聘用。方纪生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从事了“现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的共同研究和“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然而由于多年的狱中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曾多次住院。由于在京都大学的工作是无薪的，他们一家过着极度困窘的生活，然而方纪生的晚年看上去比较安稳。生前，他将自己关在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的书斋里，忘我地阅读自己喜欢的书，努力做着翻译和编辑工作，还写作随笔。他还重新开始和当年的老朋友日本作家和中国学者通信，偶尔也会相聚。他与周丰一的通信也集中在这一时期。现存方纪生收藏的书简和文章当中，来自日本著名文学者的不在少数，这些史料显示着双方保持的良好关系。很少有人知道，《华味三味：中国料理的文化和历史》（讲谈社，1981年）一书中的接受《吴家餐桌》采访的“吴夫妻”其实是方纪生和爱子。当初，周丰一也寄来了题为《中国人的酒》一文，并且约好要和编辑对谈，然而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实现⁹。1983年6月，七十五岁的方纪生因肺炎在京都大学医院去世。据说，京都大学国际交流会馆举行方纪生追悼会时，除了日本友人之外，曾受到过方纪生照顾的所有留学生和一些没有见过面的年轻的留学生也前来参加¹⁰。现在，方纪生和爱子、女婿浩（1941-2014）一起，安睡在京都郊外的陵园里。

如今，方纪生的存在将要被复杂交织的中日关系史的沟渠所完全埋没。方纪生所注视的周作人是怎样一个人？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我们

8 参见川边爱子《我和董竹君女士一起经历的狱中生活》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月，615-621页。另外，该书1997年初版没有收录此文。本书的日语版为《大河奔流》上下，讲谈社，2000年。

9 参见1981年6月讲谈社撰写的“机密”编辑资料以及1981年6月29日竹内实寄给方纪生的信等。

10 参见竹内实《悼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通信》第5号，1983年。

有必要对将聚光灯投在深爱着祖国而晚年却不得不在日本生活的方纪生身上。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走近方纪生呢？这里面有一些偶然因素，我简单解释一下写作本文的经过。我回到日本以后在九州大学攻读博士课程。从2010年开始在立命馆大学做任期制的讲师。立命馆大学的中文课因学部不同而稍有不同，通常由日本人和以中文为母语的教员搭配担任。和我同一组的中文教员中有方纪生的女儿川边比奈（方斐娜）女士。最初我不知道川边是方纪生的女儿，当我从永井英美老师那里得知以后大吃一惊。我不请自来，抱着《周作人先生的事》去川边家访问。我接连不断地提问，川边自始至终微笑着逐一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而且她还把父亲收藏的周作人的诗、书信以及堀口大学、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书和信件拿给我看。对我来说，那一天简直像做梦一样。

关于父亲方纪生，川边女士曾在1996年的中国文艺研究会夏季集训活动时做过报告。那时她的母亲爱子女士还健在，川边女士根据从年迈的母亲那里听到的往事，简要地讲述了方纪生的经历和她的回忆¹¹。直到现在，川边女士一直没有机会出版那次报告的内容。实际上她很珍视那次报告的讲稿，把它保管得很好。我访问她家数日之后，她私下里把讲稿的复印件送了过来，我高兴的心情无以言表。再次了解方纪生的经历之后，我感到一种使命感，就是要照亮方纪生，使世人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存在。同时，对于如何介绍方纪生波澜起伏的人生，我也感到苦恼。爱子女士生前几次想要记述方纪生半生的历史，都中途作罢了。川边女士虽然很尊敬父亲，但看到母亲写作的艰难，自己也很犹豫是否要深入父亲的世界。犹豫之中，五年过去了。在这其间她丈夫浩先生去世了，川边女士还有一年也要退休了。而我由于被日本学术振兴会录用为特别研究员（RPD），第二年便要离开京都了。因此我下了决心，正式开始整理和调查方纪生的资料。调查过程中发现了多件新史料，希望能够通过将把这些史料发表出来，能够稍许照亮出一个更加清晰的方纪生。以上便是本文“现在”要讨论方纪生的原委。

11 木村淳《96年合评记》载《中国文艺研究会报》第179号，以及《例会记录》载《野草》第59号，1997年2月也有关于川边女士报告的简单介绍。

本文根据我和川边比奈女士一起调查发掘的史料，对于至今几乎不曾被关注的方纪生进行了若干分析，试图将方纪生的形象展示出来。本文构成如下，括号内指执笔者。缘起（鸟谷），1. 我的父亲方纪生——其经历及回想（川边），2. 《周作人先生的事》编辑背后的点点滴滴：2-1 关于《周作人先生的事》（鸟谷），2-2 编辑秘话：来自最新发现的方纪生书简（川边·鸟谷），3. 新发现的两件周作人亲笔原稿（川边·鸟谷），结语（鸟谷），方纪生简历，参考书目。本文将进行以下三方面的工作。1. 根据方纪生的遗稿、日记、书简、笔记、川边爱子的回想笔记、以及川边比奈的回想来描述方纪生的生涯，2. 通过本次发现的方纪生的两封书信，揭示鲜为人知的《周作人先生的事》的编辑背景，3. 介绍与前一项内容相关的新史料，包括周作人的未发表原稿（初次公开的史料）。而且，在本文的最后附上了“方纪生简历”。我们希望由以上内容构成的本论文能够成为关于方纪生的基础资料，同时能够对于深入理解周作人以及中日关系史有所帮助。

谢辞：本文在执笔过程中得到了以下诸位的合作。周作人的长孙周吉宜先生（现住北京）提供了周作人收藏的方纪生的书信。方纪生的外甥方书楣先生（现住悉尼）提供了自己正在编纂中的方氏一族的家谱等有关资料。关于资料的解读，曾与方纪生有深交的木山英雄先生曾给予我们详细的指导，除了资料的解读以外，对于笔者的不足之处也赐教良多。而且，笔者以久保卓哉先生整理的《周作人先生的事》所收文章的首次刊登调查和一览表的制作为基础，补充了自己调查的内容，还使用了他提供的报纸资料等，承蒙他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给予了全面的帮助。如果没有以上诸位的合作，本文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谨向诸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我的父亲方纪生——其经历及回想

川边比奈

谈到父亲方纪生与日本的关系，首先要追溯到祖父的时代。我的祖父方宗鳌（1884-1950，字少峰）十六岁就到日本留学，1908年再次留学日本，学习商学¹²。这是遵照曾在东南亚各地经商，开糖厂兴家的曾祖父方眉锋的遗训的。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到明治大学商学科学习，毕业。明治末年，在东京与日本人古贺政子（1896-1960，佐贺县人，中国名方政英，津田英学塾毕业）再婚。祖父留学日本期间曾参加中华民国进步党，任该党东京支部政务部长¹³。回国后作为中国银行稽核，主管江西全省的业务监查。1920年受聘到中国大学任教务长兼商学系主任教授。后来出任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部教授，专心从事于教育事业。据说，后来抗战时期之所以和周作人一起在伪临时政府里任职，是由于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1878-1940）及驻北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桥川时雄（1894-1982）的劝诱。抗战结束时，祖父在兼任伪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父亲出世后祖母就去世。1908年祖父把父亲留在老家普宁，自己又回到日本继续他的学业。父亲就由曾祖母带大，在普宁和汕头度过了身旁没有父母之寂寞的幼年时代。（就是在这幼小的时候，因虫牙没有及时治疗而恶化，不得不做了大手术，结果在下巴留下了终生懊悔的伤疤。）1920年当他快12岁的时候，终于到北京得以和祖父一起居住。当时家住潮州会馆，与梁启超所居住的新会馆相距咫尺，听说梁启超常到潮州会馆来访。父亲到了北京，转入汇文小学，1923年升入汇文中学，后来考入中国大学预科，1931年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同年8月赴日本留学。出于祖父毕业于明治大学的关系，同大学校长特许免考而进入明治大学高等专攻科学习。指导教师是留美的藤江利雄先生。1934年春学

12 关于方宗鳌，参看《最新支那要人传》东亚问题调查会编，朝日新闻社，1941年，里面有详细记述。

13 参看《华侨华人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5月，以及《国家及国家学》临时增刊，第一卷第九号，1923年左右出版，现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中有祖父的文章（我进步党的政见）。

习结束，缴论文一篇，题为《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取得政治学士号。

但是，父亲留学日本以前就受周作人、顾颉刚（1893-1980）、许地山（1894-1941）的影响，其兴趣已转到民俗学方面，并以民俗学为自己的研究目标。所以，在明治大学学习时只选一些与民俗学有关或间接有关的课程去听课。直接和民俗学有关的课，例如，藤泽卫彦教授的《传说学》，这是每次必听的。又选修了河津逻博士的经济史，其古代史部分和民俗学也多有关系。也去听小说家山本有三的关于小说的讲义。这时父亲还经友人陈铮（他是鲁迅先生的老友陈仪的胞弟）和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李岐山的介绍，认识了东大图书馆长姊崎正治教授，并通过他的介绍，认识了松村武雄博士（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受到极亲切的接待，回国时先生送给父亲《神话与民族性》等书，并写了四首和歌以作纪念。回国后父亲便从他的著作中翻译出了《希腊的自然环境与神话》、《埃及人的女性观》等。

父亲还通过姊崎教授的介绍，访问了著名的民俗学研究家宫武外骨先生（俗称废姓外骨），同样受到热情接待，并参观了他的藏书室，临别送给父亲一册《卖春妇异名集》。父亲后来为纪念他，翻译了他一篇《日本卖春考》，附上几张浮世绘登在上海简又文主编的《逸经》上。另外，在留学的三年期间，仔细阅读了柳田国男、西田真次、高木敏雄等的著作及关正雄、后藤兴善等的译书。

1934年春父亲回国，到华北大学任教，在中国第一次开设了“民俗学”这门课程。同时教授“欧洲经济史”。1936年5月，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玄同、容肇祖、常惠、朱光潜、沈从文、罗常培、杨堃、及北大《歌谣周刊》编辑徐芳发起创设“风谣学会”筹备会，他们约父亲参加，地点在北京大学第一院红楼。开会时胡适指名父亲和徐芳担任会议记录。到了1936年12月，父亲应罗隆基（1896-1965）之约，担任《北平晨报》副刊《风雨谈》的主编。此周刊的主要执笔者有：周作人、舒舍予、沈从文、蹇先艾，其他还有废名、黎锦明、林庚、李长之、严文井、曹宝华夫妇、田畴、李辉英等人。（鲁迅先生的恩师藤野先生纪念鲁迅的文章《回忆周树人君》就是父亲在日本杂志《文学案内》创刊号上发现后，立刻译出登在这晨报副刊《风雨谈》上的。）1937年3月，父亲又受顾颉刚

的委托，继任他的《中央日报》之《民风》周刊（风谣学会的会刊）的主编。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伪中央电台聘请著名画家张大千等人出任咨询委员，父亲也被拉去充数，实在无法随命，只出席了三、四次会议，就想法辞退了。

1938年11月，父亲受东方书店的委托，主编其文艺杂志《朔风》。但1939年元旦发生了周作人被狙击事件，父亲听说这事件可能跟周为此杂志供稿有关，为之感到自己的责任，因而只主编到第六期就自动提出辞职。以后，父亲把《朔风》第一期至第六期订成合订本，赠送给周先生以作纪念。此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谈劝酒》、第二期刊登了《谈瘙痒》、第三期刊登了《女人骂街》，周先生的文章共三篇。父亲还亲自执笔写了《谈食道乐》，并翻译连载了夏目漱石的《玻璃门里》。¹⁴同年，周作人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父亲也应聘作为兼课讲师到同大学教授“文学概论”这一门课程。

1940年，父亲被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任命为“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3月带领华北留学生到日本赴任，以后，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日本战败。在职期间，从1941年至1943年，父亲应仓石武四郎之聘，到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大学）文学部任嘱托讲师，教授“现代中国文学史”和“宋代词选”。这是从那过了很多年以后的事了，1957年，我母亲回日本探亲时见到了仓石先生，这时先生提及父亲当年曾教过的东大学生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大多被征去当特攻队，结果全部战死。听到这消息父亲感到震惊，以后每当提起这事总是感叹不已。

在东京的数年期间，父亲作为周作人的挚友，相识了许多日本的文学家、诗人及画家。如：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堀口大学、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志贺直哉、和辻哲郎、林芙美子、谷川徹三、镝木清方、宫本三郎、藤岛武二、有马生马、里见弴、中河与一、吉川幸次、青木正儿等，并逐步和他们加深了情宜。近年，木山英雄先生在他的《林芙美子遗物中的周作人书简》¹⁵一文中曾提

14 关于创刊号登载的《朔风室札记》，可参看本节末尾的其全文。

15 参看周作人研究会电子版《周作人通讯》第3期。



【照片4】《周作人先生的事》光风馆（初版）封面

及林芙美子所藏的父亲的书简。实际上在我父亲所保存的友人书简中就有不少林芙美子等作家的书简。于是，到了1944年，为了庆贺周作人六十岁寿辰，父亲在武者小路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编辑了《周作人先生的事》一纪念册，由光风馆出版。出版后影响较大，以致到1944年5月，朝日新闻社还曾派人来说想出中文版一事，并希望父亲担任本书翻译，姑且答应了下来，但实际上正处于物资极度紧缺的战争末期，已无暇顾及。可惜中文版之事，就如此不了了之了。

父亲和周作人的相遇，可以追溯到父亲的汇文中学时代（1923-1925）。汇文中学（燕京大学的附属中学）位于北京东城船板胡同，就在燕京大学旁边。父亲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丘玉麟（1900-1960）是同乡，经他介绍，与当时任燕京大学讲师并担任周作人助手一职的许地山相识相熟。第一次与周先生见面就是被许地山带到了八道湾的周宅。实际上在那之前就 very 景仰周先生，因为比他年长四岁，同样从汇文中学毕业后留学明治大学的堂兄方遯生（生卒不详）就非常尊敬周作人，父亲也是受其影响。当时还有一位同乡，燕京大学的学生赵澄（后来成为著名摄影师）也是周家常客。周先生对待父亲同样非常亲切。此后有好长一个时期，父亲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都在周先生家度过。这里宅地很大，有好几处里院，父亲总是无需佣人到后院通报，只要先生在家，就直接前往苦雨斋。每次来也并非有什么事情或问题请教，只是找个不影响先生的角落坐下，默默聆听先生和来客的对话。这就能让父亲非常地满足。据父亲自己说，他是在模仿俞平伯（1900-1990）和废名（1901-1967）等人。

父亲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他是八个兄弟姊妹的长子，祖父对他很严厉。因此

他的少年时代时常感受到精神上的寂寞。如此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很自然地被周先生的和蔼可亲的人品所吸引，并视为亲生父亲一样地敬仰周先生。他一直不忘记第一次给周先生写信，得到先生的回信的事情。那大约是1926年，首次得到先生的亲笔信，如获珍宝，简直欢喜若狂。信的内容极简单，大约有五、六行，内容是：“你所提的问题，星期日来时面谈，写信反而说不十分明白。”那信封和信笺是那样的考究而又朴素美观，父亲说他从不忘记那用木刻印刷的详细图案。并说，先生以后的信也多如此。



【照片5】周作人给方纪生的书笺1

父亲还在他亲笔写的回忆文里写道：“最令人难忘的是1928年先生写赠给我的横披，写的是袁中郎的“瓶史”中一段半白半文的句子，读来十分亲切、有趣。许多朋友都还记得，当时有不少朋友特为看这横披而来访。”现在，我手头还保存着一张照有这幅横披的老照片，照片背面有当时父亲亲笔写的字，是这样写的：“纪生誌：我的屋子之一部，潮州会馆正厅的东房，周作人先生的字照上了，我真是十分喜欢呦！（1928年6月21日所摄）”推算起来，当时父亲也只有十九岁，对一个才十九岁的青年来说，这会是多么令他激动，而又感到光荣的事情啊。父亲还回忆说：“后来周先生赠给我的小中堂也不少，但因这是第一次所以一直保存着。直到文革才被毁掉，和其他小中堂一起被文革一扫而光”。

照有横披的照片是2016年6月，久保卓哉先生帮我整理父亲的相册时发现的。本来照片又小照得很模糊，承蒙久保先生解读，特记内容如下：

[周作人的横披] (按照横披原文改行。)

京师西山碧云寺水
裂帛湖水龙王堂水
皆可用一入高粱桥便
为濁品凡瓶水须经风
日者其他如桑园水满
井水沙窝水王妈々井
水味虽甘养花多不
茂苦水尤忌

十七年六月三日錄袁中郎

瓶史谚应

紀生兄求 周作人



【照片 6】周作人的横披

从这幅横披，可以看到父亲和周作人自很早以前就开始建立了极为亲密而相互信任的关系。自那时起，数十年來父亲一直崇拜、敬仰周先生，他们二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所谓师徒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周先生与世长辞。

我父亲和我母亲的相遇，那是 1940 年父亲作为“留学生监督”到东京赴任不久的事情。母亲川边爱子¹⁶。当时正在三越百货公司总店的图书部工作，经朋友的介绍，到父亲的办事处工作。一天三个小时，工作的内容，除了日常事务以外，主要是帮助父亲阅读和翻译书籍。剩下的时间就是陪父亲聊天。

母亲的爱好本来就是读书，据母亲说，认识父亲以后，首先令她感到敬佩的

16 中国名：方爱芝，生于东京，1931 年东京市立第一女子学校毕业后，从同年 4 月到 1940 年，在三越百货公司总店工作。结婚以后，从 1964 年起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79 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日语教师。

是父亲对日本文学造诣之深，以及知识之广泛。因此，和父亲一起工作感到很愉快。在这个时期，父亲翻译的中河与一的小说《天上人间》就是母亲看了后深受感动而推荐给父亲的。父亲决定把它译成中文，便去找好友堀口大学先生商量，堀口先生很赞成，并说永井荷风也在称赞这本书，他立刻为父亲给中河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这本书就是这样，是经著者本人同意翻译的。这也是父亲和中河先生的初次相遇。后来，中河与一先生于1980年出版的《天上人间》（《天の夕顔》）国际版的序文里介绍说，父亲翻译成中文的《天上人间》后来在中国拍成了电影。但是，估计这是指战后在香港拍的由李香兰（山口淑子）主演的同名电影，但实际情况怎么样，却无法弄清¹⁷。

我父母是两年后的1942年结的婚。我出生于第二年3月3日。说起我名字的由来，那还是由堀口大学先生提议而起的。3月3日在日本是传统的女儿节，日语的发音是“hina”，先生说就用这个发音好，父亲就用中文给我起名为“斐娜”。先生还为庆贺我的出生，赠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装在水晶鸟笼里的兰色的水晶小鸟和精致的女儿节摆设用的偶人套盒。关于此事，我自幼经常听母亲谈起。

提起父亲和堀口大学先生的关系，父亲编的那本《周作人先生的事》一书收录的堀口大学先生的文章里写得很详细，当时父亲位于牛込区新小川町的办事处离堀口先生居住的江戸川公寓很近，只隔一条街而相对，如他说的，多的时候，一天可见到三、四次，所谈的话题十分广泛，如：周作人寄来的信和诗作等，围绕周作人的所有的事，再有就是互换彼此新作的诗，探讨诗的翻译等，关系十分密切。之所以他们二人能够如此亲密，那当然，首先是相互为对方的人品所吸引，另外，据母亲说，他们的境遇有相似之处：出生后不久就失去母亲，继母是外国人，父亲是外交官或官员，生长于礼节等严厉的家庭环境等。所以，推测他们自然而然地能够理解对方当时的寂寞心情并产生共鸣。所以，尽管战后被迫远隔大

17 参看山口淑子、藤原作弥著《李香兰 私の半生》1987年，新潮社，376页。



【照片 7】与堀口大学先生和父母（1980年7月）

海相离别，然而，堀口先生在父亲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精神支柱。1980年终于在东京实现了重逢。到先生家看望时，先生当场在他当时刚出版的著作《秋黄昏》扉页上挥笔写道：“赠方纪生君 55年7月12日 久别重逢，充满喜悦”，赠送给父亲。并和我父母一起合影

留念。（参看照片7）第二年，堀口大学先生不幸逝世，噩耗传来，父亲为了表达衷心哀悼，特意为自己编了一册《堀口大学诗宗荣哀录》，一直放在身旁。

* * *

1942年结婚后，父母在靠近父亲办事处的牛込区药王寺安了家。由于战况恶化，1944年3月搬入了位于新宿下落合一处位于高岗的房子。这房子是父亲的友人林芙美子女士家的，她为逃避战火而离开东京时借给了父亲。因为觉得这里庭院宽广，或许会安全一些（林芙子的夫君手塚绿敏先生则留在了该房后院的画室）。此后父亲出于安全考虑，又将家人从东京疏散到轻井泽，他自己因办事处工作留在了东京，时不时地去轻井泽探望一下家人。（在轻井泽借住的是早稻田大学校长田中穗积先生别墅一部分。）1945年5月25日的东京空袭中父亲的办事处被炸毁，他也因此迁至轻井泽，在那里迎来了战争结束。

1945年10月，父亲被美军（联合国军）关入巢鸭拘留所，1946年又被遣送至南京接受了审判，因“通敌叛国”罪被判处4年监禁。1949年1月，与周作人同时出狱，同周先生一起被上海尤炳圻（1911-1984）家收留，在那里迎来了上海解放。

1949年10月回到北京，经罗隆基介绍，到新政府的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校长吴玉章，后来与华北革命大学合并）。同时一起参加学习的有：冯友兰，及友人沈从文、游国恩、容肇祖、李长之等，多是大学教员等知识分子。（学习目标

及方针为：“为了能够为新社会服务，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通过学习，父亲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所感动，并产生了共鸣。

1950年学习期满，回到教职。父亲便把我和母亲从日本叫回北京。当时我七岁，已在这两年前从轻井泽迁回东京，是青山学院初等部二年级的学生。从横滨坐船经青皇岛，于1950年12月24日（正是圣诞节前夜），到达北京。

但是，尽管通过在华北革命大学的学习，父亲决心脱胎换骨，全心全意为新中国服务，父亲解放以后所走过的道路，却是极为不平坦的。由于在战争期间任过伪职，加上家庭的所谓“海外关系”：妻子原籍日本，自己的兄弟姊妹大多在日本留过学。政治运动一来，经常被列入斗争对象，许多关口都过去了，但到了文革，人人要过关，但父亲过的却是个大关，以“里通外国分子”这莫须有的罪名，和母亲一起被关进了监牢，坐牢竟达七年之久。1975年7月被释放，恢复自由，但正式恢复名誉，却是在那四年以后，1979年3月的事情。

解放以后，由于父亲和周作人二人都被贴上了“有历史问题”的标签，没能象一般人那样公开地交往¹⁸。而实际上，直至文革开始，父亲还是经常去八道湾去看望先生的¹⁹。也有书信往来。另一方面，父亲和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先生则一直保持着极为亲密的交往。文革中周作人先生一家的情况，也不时地通过周丰一先生那里得到了了解。

周作人先生去逝世之前，将他亲笔写的未曾发表过的稿子送给了父亲。后来，周先生逝世以后，丰一先生又将作人先生生前爱用的砚台和两枚印章（一枚刻有“周作人”三字，另一枚刻的是“十堂私印”四字，参看照片3）送给父亲留念。其砚台，在1980年父母到日本来时，在北京机场被海关当作“文物”没收。至今不知去向。当场，父亲怎么做解释也无用。后来我们夫妻又去海关交涉也不予以理睬。后来，每当想起这事就感到窝心。幸亏那两枚印章没被发觉，平安地带

18 然而，这只是因为我当时还小，没有记忆罢了，后来从发现的父亲给周作人的书简，及周作人1951年2月的日记里，还提到我小时被父母带到周宅去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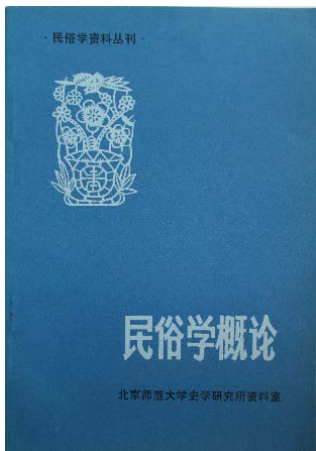
19 关于这一点，最近周作人的长孙周吉宜先生的来函中还提及。上文所提关于父亲的书简及周作人日记，也均为周吉宜先生所提供。

到日本。这印章父亲去世后由我母亲，母亲去世后由我保管着，以作为父亲自幼景仰，并终生结下了深厚友情的周作人先生的纪念。父母来日以后特别是父亲去世之前，和丰一先生一直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1983年丰一先生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立即给母亲来信表示深切的哀悼，看了不禁催人泪下。

1980年4月，父亲陪母亲回日本探亲，并治病疗养。同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作为中国最早的民俗学概论书，出版了父亲写的《民俗学概论》一书，这是父亲1934年在华北大学任教时编写的讲义。当时铅印成册发给学生的，同时也送给了顾颉刚先生一本。没想到顾先生一直保存着，直到1980年，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先生发现，决定出版问世。

到日本以后，父亲在东京一边到医院治病，一边去访问老友们，重温友情。特别是与当时还健在的堀口大学先生、古川徹三、中河与一、松枝茂夫等的重逢，对父亲来说是极大的喜悦和安慰。在这期间，还得以和长年有着书信来往的竹内实先生，以及平冈武夫、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丸山昇、饭仓昭平、砺波护、立间祥介、直江广治等诸先生相识，父亲感到很荣幸。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为了做一点对中日文化交流有益的，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便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出1930年代的周刊杂志《骆驼草》的原书提供给伊藤虎丸先生。记得，当时还是我从父亲北京的书斋中取出，趁出差来日本时带到东京的。

1981年秋，我到京都的一家出版社工作，我们一家也从北京迁至京都。为此，我父母也从东京迁到京都。在京都，父亲得到竹内实先生的特别关照，作为“京都大学招聘外国学者”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参加“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共同研究，并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这个时候，父亲表示要撰写大正、明治时期的文学家，武者小路



【照片8】《民俗学概论》封面

实笃、谷崎润一郎、堀口大学、佐藤春夫、志贺直哉、古川徹三、柳田国男、岛崎藤村等人的回忆录，并一点点地做准备。同时，又为东京的中文杂志《日本展望》提供《孙中山和犬养毅》、《石川丈山和诗仙堂》、《京都的时代祭》等随笔。

另一方面，父亲准备等恢复了健康，就再回中国去为祖国服务。为此，他始终没有辞去河北师范学院的工作（即“停薪留职”）。我觉得这一点，父亲和中国许多抱有这种想法的老知识分子一样，在解放后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他的爱国心是不会变的。

在这里，关于我自己也想简单地做个介绍。我出生于东京，如前所述，七岁时和母亲回到北京。正值小学二年级，以后一直在北京读书、工作。幸运的是，从五十年代中期起有机会接受“英才教育”，进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习，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毕业，都是在中央美院度过的。后来在博物馆，再后来在美术出版社工作。但是这数十年间，在中国，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整个社会很不安宁。特别是父亲不断经历了政治斗争的风波，在他任教的大学也因背着“历史问题”这个黑锅，受到歧视，承受不平等的待遇。在文革中，我之所以和男朋友，自高中以来的同学结婚，也是由于父母突然被关进监牢，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两人决定共同度过这个难关一同活下去。可是，我父母被纷纷关进牢里，甭说是自己的女儿在哪里（包括结婚），就连老伴关在什么地方，都无从知道。他们就如此，度过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简直无法形容的苦难的狱中生活。可是，尽管这样，父亲在我面前却从来没有流露过任何不满，他总是从正面教育我，在小学当三好学生加入少先队，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加入共青团时父亲喜悦的心情从他的日记里也可看到。

如上所述，1981年秋，随着我到京都一家叫美乃美的出版社就职，父母也从东京迁至京都，父亲到京大人文研究所参加研究工作。可是，不久出版社倒闭，我经竹内实先生的介绍，从1994年4月起到立命馆大学任兼课讲师直至2016年3月退休。现在还在立命馆孔子学院担任几节中文课。对于自己的父亲，我是很尊敬的，但是对于他毕生从事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之详细情况，很长时间没有主

动地去了解。那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之一，是我自幼在父母的鼓励之下学习美术，这样，在专业、爱好和兴趣上自然而然地与父亲从事的文学有一定的距离。另外，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触及日本及过去的事情。虽然对父母经历的坎坷的人生，我也有所关心和理解，后来也曾想整理出来。大约二十年前，那时母亲还健在，在她的帮助下，写过一次关于父亲的经历和回忆，但只停留于写了讲稿（参看前面鸟谷女士的文章），终未实现付梓。再就是多年忙于生计与工作，无暇顾及也是事实。近年来，觉得将父母经历的坎坷人生，以及父亲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出的努力等的实际情况整理出来，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只是感到一个人无能为力，担子过重。就是在这次，大学即将退休之前，终于遇到了鸟谷女士，这位合作伙伴。才决心真正着手整理、研究有关父亲的资料，将父亲的事情写出来。

到了1983年1月，父亲因患感冒恶化成肺炎，住进京都大学结核胸部研究所附属医院治疗。一度病危，经医院院长、医生、护士们的努力，病情得到好转，但到6月病情重新恶化，于6月8日去世。那时还差两个月就75岁了。住院期间，承竹内实先生以及京都大学校长泽田敏男先生，还有，京大人文研究所所长及其教授们到医院看望。葬礼时也有许多先生来参加。另外，提到送葬时的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者中还有几位京大的中国留学生，父亲生前与他们并不直接相识，可是，他们一听到父亲去世，当晚就赶来陪我和母亲在灵前守夜，并要求我们讲述关于父亲为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事情，当第二天告别式结束时，他们主动地跑来抬棺，送到殡车上。我看到这情景，百感交集，不禁泪下。虽然，父亲曾经当过“办理留学事务专员”（实际上是协助和管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如今已过了几十年，那是旧时代的事了，中日关系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在的中国留学生还是如此敬重他，怎不叫人感动呢。葬礼以后，又承京大人文研究所的好意，还特意在京大国际交流会馆为父亲开了追悼会。回忆父亲的一生，受尽了时代的摆布，充满了波折。特别是解放以后，尽管由衷地祝愿自己祖国的富强，并付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但是得不到一点回报，最后反而违反自己的意愿埋骨于异国他乡。可想见他自己的心情该是多么地复杂。但幸运的是，他的晚

年实现了和老友的重逢，重温了友情，并又新相识了不少学者，我想，这最后的岁月，必定给了他许多精神上的安慰。

* * *

父亲既不抽烟又不喝酒，他的爱好，那该说是读书和收集书画及民间工艺品等的吧。从小在我眼里的父亲，总是坐在书斋的书桌前看书或者写东西。书斋整理得整整齐齐，房间四周的书架上摆满了中文和日文书籍，各占一半的样子。书架以外的装饰柜上摆着日本的工艺品，如木偶人、扇子、木雕，还有中国的民间工艺品。墙上挂着书画，这些大多是友人所赠送的，如蒋兆和的画，金禹民、启功、顾颉刚、沈从文等的书法。所有这一切，布置得又优雅又有情趣。的确，从父亲的这些藏书、书画和工艺品等，可以看出他自青年时代从周作人那里所受的影响。

度过了孤独的少年时代的父亲，自幼迷上了文学，立下了毕生搞文学的志愿（例如：父亲还是在中国大学学习的时候，1928年就主编了《中大学生》周刊）。后来，幸运地认识了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影响下，接触了民俗学和日本文化，并逐渐地热衷于这些的研究。从此，为了做中国和日本文化交流的架桥人，不断付出了努力。就是如此，父亲从小就热爱文学，交的朋友都是文化界人士，因此他对政治等本来就毫不感兴趣，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所以，1930年代他所主编的杂志也全是纯文艺性刊物。我想在这里再强调一下的是，父亲在受委托主编刊物时，就以只编纯文艺的内容为条件而接受的。能反映这一点的，请参看1938年出版的《朔风》杂志创刊号，即第一期的编后记《朔风室札记》，便可有所了解（参看本节末尾（一））。至于，后来父亲之所以充当伪职，担任了“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这也是由于当时任伪政府官员的祖父的关系而被任命的。据母亲讲，父亲在职期间，在日本交往的全是文学家，艺术家等文化界人士，他总是对母亲讲，他最讨厌的是那些政治家和官员，和他们格格不入。父亲并在他亲笔的“自述”里还讲到，自己之所以接受这个任命的理由，是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到日本去继续研究日本文化，并能够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为此，对他所负责的中国留学生，则经常对他们“训话”说：“一定要好好学习日本的先进技术，回国以后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并告诫：“要尊重日本文化，和日本人民良好相处。”在这期间，他自己也以身作则，如上所述，受嘱托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教授“现代中国文学史”和“宋代词选”。同时和日本众多的文学家，艺术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不断加深交往。这些，又为周作人和日本的文学家的交流起了桥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由于过去的经历，几经艰苦的境遇。但是，他爱国的信念和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的愿望却从来没有改变过。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和竹内实先生之间长期的互换中国和日本新出版书籍之往来，也可以说明这种努力。恢复教职后，在大学先是教与民俗学有关的儿童文学，后来转到外国文学系，专门负责教日本文学。实际上，解放以后他还一直坚持不断地将日文书籍翻译成中文，不但用于教学，而且尽可能地往出版社投稿，为中国读者介绍日本文学。这一切行动都出于为中日文化交流做贡献的愿望。父亲去世后，竹内实先生在《东京新闻》（1987年7月）上发表追悼文章，把父亲称作“日中的架桥人”，我觉得也许这就是父亲的人生意义之所在。

* 以上，是1996年9月3日，在滋贺县须贺谷温泉举行的中国文艺研究会夏季集训活动之研究会上的讲稿为基础，又加以修改和补充的。

（一）『朔風』創刊號 方紀生「朔風室札記」（1938年11月2日）

※ 划线为笔者所加

這個純文藝刊物的誕生，在我個人實出意外，因為我事先並沒有想在這時候來辦雜誌的意思。不，當最初陸語冰先生向我提及此事時，我還曾經婉謝過的。上月初旬，陸先生又偕同東方書店主人見訪，再三言及此際北方文壇之沉寂，知識階級之缺乏定期刊物可讀，並說明書店發行刊物動機純在應時勢之需求，可向中上階級供給一些精神的糧食，毫無其他作用。其志趣甚高，其情意甚殷，於是纔在不談政治時事，編輯方面付與全權，並與陸先生共同負責及其他的條件之下，

答應加以考慮的。

答應了之後我就開始想了想，是的，誠如書店主人所言，年來北方的確沒有純文藝刊物可讀，在這種環境下，一個雜誌出來打破沉寂，或許不無些許意義也未可知；不過，重要的問題，刊物先得要有撰稿者，在此作家星散之際，僅有的先輩和朋友們，都肯執筆撰稿麼？這是我先要考慮的。還好，也同樣的是實出意外，當我直接間接說明刊物的性質，向他們徵稿時，周作人，錢稻孫，徐祖正，沈啓无，畢樹棠，楊內辰，尤炳圻，陳綿，張壽林，謝興堯諸先生，及其他的友人均先後答應寫稿，給了我不少的勇氣，覺得似乎略有把握，於是纔通知書店方面，答應了來試試辦。這是本刊出版前的經過。

至於刊物之命名「朔風」，乃書店方面所決定，想來沒有什麼特別的深意。如欲解釋，或可說是因為出版地在北方，寫稿者也多在北方，而發刊期也正好是將刮起西北風的時節的緣故罷。

本期承周作人，錢稻孫，沈啓无，畢樹棠，陳綿諸先生賜稿，給本刊增加了不少的分量，編者不勝銘感。諸先生並允為長期撰述，尤為本刊之幸。周先生文題已定為「用心隨筆」，此後每期擬登一二篇，年來止苦無從讀到先生的文章者，從此再得捧讀的機會，想來必定和編者一樣，感到無限喜悅的罷。

外來的稿件，除去譯稿已聘專家擔任外，我們極為歡迎。倘承讀者見賜，其合於本刊性質的作品（可參閱投稿規約），無不樂予刊載。

十一月二日之夕，方紀生記。

2. 《周作人先生的事》编辑背后的点点滴滴

2-1 关于《周作人先生的事》

鸟谷真由美

本节首先要介绍方纪生编辑的《周作人先生的事》一书的基本内容。

《周作人先生的事》是方纪生为了庆祝1945年周作人迎接60岁寿辰而编辑的论文集，此书收集了日本的文学家和出版家等文化名人执笔的关于周作人的文章。那时方纪生住在东京，此书于昭和19（1944）年9月由当时在东京神保町的光风馆出版了1000册。此书封面上有武者小路实笃写的“周作人先生的事方纪生编”的题字和他画的以墨镶边的彩色芜菁，以及“实笃”的签名及其落款。另外，此书封面内页是有岛生马用墨描出的“周作人先生的事”的题字。接下来登载的，是与周作人有关的九张照片。因篇幅所限，这里只列出照片的解说（原文），以此来介绍照片。〈日本留學當時の周先生 千九百十年十二月於芝公園寫〉、〈先生近影 民國二十九年編者寫〉、〈先生と酒罌 堀口大學氏「豆花」參照 民國三十年六月寫〉、〈先生の日本間書齋の一隅 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寫〉、〈先生の御家族 民國二十三年寫 長男豐一氏、長女靜子氏、先生、夫人信子女史〉、〈先生を圍む日本文壇人の集り 武者小路実篤氏「周作人さんとの友情・想ひ出など」參照 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七日於東京星ヶ丘茶寮寫 右から 島崎藤村氏、志賀直哉氏、里見弴氏、谷川徹三氏、有島生馬氏、菊池寛氏、豊島與志雄氏、柳澤健氏、佐藤春夫氏、武者小路実篤氏、周先生、錢稻孫氏、堀口大學氏〉、〈書齋前の先生と武者小路氏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寫〉、〈白石紙を詠むの詩 堀口大學氏「豆花」參照〉、〈周先生手拓南齊磚硯〉。关于选登这些照片的详情，可以参考第2-2节介绍的方纪生的书简。

照片的后面有方纪生的《编者序》和给迎接花甲寿辰的周作人的献词（见本文开头）。在《编者序》中有如下一段话。“我们在此向先生谨表祝贺，也希望先生晚年的每日环境愈发闲适。希望今后先生为了中国民族，为了中日文化交流，

也为了后世青年，能够继续创作出不朽的著作。而且我们期望下次在先生迎接古稀寿辰之际，能够向先生奉献更具体的纪念活动”。这一段话的后面，排列着目录和总共 19 名作者的文章。关于所收文章的著者和标题，请参阅下述【《周作人先生的事》所收文章的首次刊登状况一览表】。

另外，该书还收录了《附录》由周作人执笔的《日本留学的回忆》、《武者先生和我》、《岛崎藤村先生》、《日华文化的提携与中国文学的动向》四篇文章，再加上《周作人先生著作年表》，真可谓是内容豪华的一本书。由如此众多的日本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文化名人来论述一位中国作家的书，《周作人先生的事》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大，第二年便计划出版中文版，但最终未能实现。

50 多年之后，1995 年大空社出版了该书的影印版。今天能够读到的《周作人先生的事》大多应该是大空社版本。该书卷末《传记丛书 发行之际》写道：“鄙社计划从明治以后发行的大量传记中选择活跃在近代日本所有领域的先贤的杰出传记，连续逐次发行。我们选择的标准不是有名无名，而是主要考虑其内容和资料的价值，期望这些书能够成为今后各界研究用的基本图书。”²⁰。只是，大空社版本的封面上没有实笃画的芜菁图（见照片 4）。

《周作人先生的事》中收录的文章并非全部都是首次发表的文章。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文章的写作时期不尽相同，既有出版几年前写的，也有出版前后写的。这里列出了“《周作人先生的事》所收文章的首次刊登状况一览表”，包括作者的名字和题目、执笔时期。为了方便全面了解当时日本文学界和出版界的情况，这里保持原文。

20 《周作人先生的事》大空社，1995 年。

【《周作人先生的事》所收文章の首次刊登状況一覧表】

『周作人先生のこと』光風館昭和19年9月18日発行			初出文献					備考
著者	題名	記入年月	題名	掲載新聞雑誌所収書籍	巻号	出版年月	出版社	
武者小路実篤	周作人さんとの友情・想ひ出など							
同上	周作人さんとの友情	昭和19年1月						大约是为本书新写
同上	周作人と私	昭和16年4月	周作人さんと私	婦人畫報	448	昭和16年6月1日	東京社	
同上	周作人との友情の想ひ出	記入なし	周作人との友情の想ひ出	文藝	9-6	昭和16年6月1日	改造社	
同上	周作人氏への手紙	昭和16年3月	周作人氏への往信 動亂のなかに尊く生かす心	讀賣新聞		昭和15年6月21日 (朝刊)		
同上	周作人	昭和14年3月	周作人	日本評論	13巻4号	昭和13年3月1日	日本評論社	
谷崎潤一郎	冷靜と幽閑 周作人氏の印象	昭和17年9月	きのふけふ	文藝春秋		昭和19年9月号		从《きのふけふ》中摘录
堀口大學	豆花 方紀生君に寄せて周作人先生を語るの文	昭和19年立春		本书首次刊登				
林芙美子	東京から周作人氏へ	昭和16年5月	周作人氏へ	文藝	9-5	昭和16年5月号	改造社	

佐藤春夫	日華文人の交流 周作人・錢稻孫兩先生を語らんとして	昭和16年4月	日華文人の交驛 (一) 周、錢兩先生を語らんとして 日華文人の交驛 (二) 周、錢兩先生を語らんとして	朝日新聞		昭和16年4月22日 (朝刊) 昭和16年4月23日 (朝刊)		
奥野信太郎	周作人と錢稻孫							
	周作人のこと	記入なし	周作人のこと	大陸	4-2	昭和16年2月号	改造社	
	周作人と錢稻孫	記入なし	周作人と錢稻孫	『隨筆北京』		昭和15年3月5日	第一書房	
清水安三	周三人	大正13年	支那の新人 周三人(上) 支那の新人 周三人(中) 支那の新人 周三人(下)	讀賣新聞		大正11年11月24日 大正11年11月25日 大正11年11月27日		執筆者名：北京如石生 執筆者名：北京如石生 執筆者名：北京如石生
松枝茂夫	周作人先生のこと	昭和14年7月補記：昭和19年6月	周作人一傳記的素描一	中國文學	60号	昭和15年4月1日	中國文學會	本書85-89頁の前文大約是為本書加寫
鶴見祐輔	訪問記	大正11年8月	周作人君	『壇上・紙上・街上の人』		大正15年11月18日	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	
山本寅彦	周作人の心境	昭和12年作	周作人の心境	『支那事變 北支之卷』		昭和12年10月19日	改造社	

後藤 末雄	周作人を 訪ねて 一二	記入な し	一四 香 妃の話、 錢稻孫・ 周作人兩 氏との會 見 一五 大 同の石佛 と北京大 學の招宴	『藝術の 支那 科 學の支那』		昭和17 年10月 20日	第一書房	从《藝術の支那 科學の支那》的 兩章中摘录
加藤 將之	特辨とし ての周先 生	記入な し	華北教育 事情と興 亜讀本 北京の役 所風景	『華北の 風物文化』		昭和18 年6月 1日	山雅房	大概是应方纪生 的要求，加藤将 之为本书新写
白井 亨一	雅俗兩道 教育總署 の周先生	昭和19 年2月						首次刊登文献未 详
一戸 務	「苦茶隨 筆」日譯 の序附、周作 人文學序 說	昭和15 年9月 昭和19 年6月 (※)	序	『苦茶隨 筆』一戸 務 譯		昭和15 年9月 17日	名取書店	此文由昭和15年 9月和昭和19年 6月写的兩篇而 成。在《序》中 有“昭和十五年 九月中旬”的记 述。 ※关于昭和19年 6月的后半一部 分的首次文献未 详。大概是应方 纪生的要求为本 书新写
吉川 幸次 郎	バスカ ルの葦	昭和19 年4月 1日 西京詰 曲居		本书首次 刊登				大概是应方纪生 的要求为本书新 写
清見 陸郎	周先生と 談る	昭和16 年4月	周作人氏 と談る	『北京點 描』		昭和16 年10月 10日	大都書房	
内田 誠	嘉湖細點	昭和18 年12月						首次刊登文献未 详
武田 泰淳	周作人と 日本文藝	昭和18 年9月	中國人と 日本文藝	國際文化	27号	昭和18 年9月 10日	國際文化 振興會	在末尾中有“笔 者是日本出版会 海外課支部主任”的记述。

方紀生	周先生の 點々滴々	民國31 年3月	周作人先 生の點々 滴々	大陸	5月号	昭和16 年5月 1日	改造社	在末尾中有“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于东京市新小川町附记：笔者方紀生先生是前任北京大学文学部讲师，且现任华北驻日留学事务处长”的记述。
附録								
周作人	日本留學 の想ひ出	壬午小 寒、於 北京	留學的回 憶	留日同學 會季刊 (中國留 日同學會 季刊)		1943年 2月15 日	中國留日 同學會 (北京)	参阅中岛长文补正《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补正(1898年-1966年)》2015年3月。
	武者先生 と私	且 住 譯、東 京にて	武者先生 和我	天地	3期	1943年 9月24 日		上同
	島崎藤村 先生	紀生譯	島崎藤村 先生(方 紀生譯)	揚子江	7卷5号 (68)	昭和19 年5月 7日	揚子江社	《扬子江》是由扬子江社(东京都神田区)发行的日文杂志。
			島崎藤村 先生	藝文雜誌	1卷4期	1943年 10月	藝文社	参阅中岛长文补正《周作人著译篇目系年目录补正(1898年-1966年)》2015年3月。
			島崎藤村 先生	風雨談	7期	1943年 11月	風雨談社	上同。 周作人执笔日期：“中华民国32年8月23日”
	日華文化 の提携と 中國文學 の動向	昭和17 年3月、 談話	中國文學 の動向 日華文化 の提携に ついて(上) 文化の根 底は一 日華文化 の提携に ついて(下)	朝日新聞		昭和17 年3月 18日 (朝刊) 昭和17 年3月 19日 (朝刊)		

从上表很容易发现,《周作人先生的事》收录的大部分文章集中发表于昭和16(1941)年前后。这一年是《周作人先生的事》出版前三年,周作人进行了他一生中第四次访日。上一次访日是1934年,为探亲而来日本的。周作人这一次来日本,是因为他于1941年1月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督办,出席同年4月召开的“东亚文化协议会”²¹。昭和16(1941)年4月17日,岛崎藤村主办了以周作人为中心的座谈会。有关当时座谈会的情景,第二天的《朝日新闻》以《日支文人“春天的清谈”——聚在周作人身边的一刻》为题进行了报道,《周作人先生的事》前面的第六张照片应该是当时报道中使用过的(见照片9)。

据报道,参加座谈会的有有马生马、菊池宽、佐藤春夫、志贺直哉、谷川徹三、丰岛与志雄、岛崎藤村、堀口大学、武者小路实笃、柳泽健、里见弴等十一位日本作家,中国方面除了周作人之外,还有钱稻孙、方纪生(报道中介绍其为

“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和尤炳圻(报道中介绍其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三人。据说是“日本笔俱乐部书记长”(按原文直译)夏目三郎联系了这三个人。《周作人先生的事》收录了曾经出席座谈会的武者小路实笃、岛崎藤村、堀口大学、佐藤春夫,以及林芙美子、奥野信太郎、清水安三、松枝茂夫、鹤见佑辅、山本实彦等一共19名与周作人有过交流的文化人的文章。这些文化人在文章中记述了他们与周作人的交流以及与周作人的文学有关的内容。



【照片9】《日支文人“春天的清谈”：聚在周作人身边的一刻》的报道(《朝日新闻》1941年4月18日)

21 参见鸟谷まゆみ《漂泊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周作人の立教大学訪問時における新史料から》《中国21》第50号,东方书店,2019年3月,173-196页。

2-2 编辑秘话：来自最新发现的方纪生书简

川边比奈·鸟谷真由美

这次我们发现了方纪生寄给周作人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是北京的周吉宜先生在得知川边比奈和我正在进行方纪生的调查之后，从周家所藏数量庞大的书简中找出来的。川边比奈经堂弟方书楣的介绍，2015年夏季之后通过电子邮件与周作人的长孙周吉宜先生有过交流。我在留学时代经朋友介绍曾访问过当时还健在的丰一夫人张莼芳女士，那时曾见过周吉宜先生一面。据周先生所言，周家保存着周作人收到的大量的书简，尚未整理完毕。方纪生的信便在尚未整理之列。周吉宜认为在周家发现有关方纪生的史料的可能性很大，并答应发现之后随时向我们提供（2016年6月25日，鸟谷访问了周吉宜先生家）。

这次发现的方纪生的信的写作日期，一封是1944年2月15日（A），另一封是同年9月28日（B）（见照片10）。两封信都写于《周作人先生的事》出版前后，从这两封信不仅可以知道此前不为人所知的《周作人先生的事》的编辑背景，而且还可以一窥战争结束前夕东京混乱的样子。

从（A）可以发现委托光风馆出版《周作人先生的事》的缘由，以及该书收录的堀口大学给周作人的书信（《豆花 寄给方纪生君 讲述周作人先生的文章》）是经过周作人本人校正的。而且信中还提到，在堀口执笔之际，方纪生曾设法得到《瓜豆集》并提供给堀口作参考。不难看出，作为编者的方纪生提供了全面合作。就连该书前面刊登的几张照片，也并不是方纪生随意选的，而是在经过和周作人本人商量（有时是周作人提供）之后决定的。可以说刊登在《周作人先生的事》的照片是周作人亲自所选。另外，关于《茶之书》出版之际，译者方纪生曾亲自委托周作人作序，周作人答应一事，以及方纪生到林芙美子家避难的经过等有关方纪生当时在东京的生活也有详细记述。另外，信的内容显示，方纪生对上海的动向极为关心。

（B）是方纪生在疏散地轻井泽写的信。从字面上可以看出方纪生对《周作人先生的事》的出版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在《周作人先生的事》发行之前，方纪

生便通过“上原氏”将该书数册寄给了周作人。而且，该书初版发行了1000册，其中只有100册带有包装纸盒。川边比奈保管的方纪生的藏书、我收藏的初版书（承蒙北冈正子氏转让）都不带纸盒。十年前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看到的初版书（由于是非开放书架，平时的保存状态不明）也没有纸盒。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一点。大空社的影印版本（传记丛书）带有纸盒，非常偶然，这便是仅有的百册《周作人先生的事》初版书的样子。

周作人和方纪生有着很频繁的书信来往。方（川边）家还保存着数件周作人寄来的其他信件和笔记。希望这些资料在完成相关手续之后能陆续公开。这次发现的方纪生书信显示，周作人平时通过方纪生获得日语书。尽管还不能确定那些书是由周作人委托购入的，还是住在东京的方纪生发现新书之后送给周作人的，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周作人在获得日语书过程中，方纪生给予了大力合作。

本章收录了方纪生寄给周作人的两封信的中文全文。考虑到其内容和资料的价值，这里以原文如实展示，空格及换行处亦遵照原文。注释为笔者所加。

(A) 方纪生寄给周作人的信（1944年2月15日）

知叟尊鉴：接奉

一月廿八日及卅日大諭均先後拜悉，至為欣慰。匯款三百圓，亦於昨日自郵局取到，乞勿垂及。式場〔式场隆三郎〕等之書，一俟通知到來，當即往付款領取，然後設法送上也。

紀念冊題曰「周作人先生のこと」，題字已由有島生馬先生寫好，裝訂武者先生亦欣然負責，不久可以交下，出版書店已決由光風館承擔，因該館存有較好紙張，並允尽可能特製紙匣故也。堀口長信已交下，明日另函奉寄，其中所引紙賦〔指堀口大學引用了周作人所做的賦〕恐有誤舛，敬請改正賜寄。「瓜豆集」彼或未見，此間仍可購得，容入手時贈之。年譜日內可以奉寄，因附在卷末，稍緩無妨，故遂因循耳。卷首擬插圖數幅，司徒喬〔1902 - 1958、畫家〕所繪五十壽辰之像，倘有相片，甚擬得之。又最近小影亦乞賜寄一幅或數幅，如與武者

合影，照的不佳，似亦不妨列入也。藤村及有島那扇面，倘能令寫真屋照相，則附入其中，尤为好玩，未知叟以为然否？

陶亢德君〔1908-1983、《宇宙风》编者〕近常見，已決本月廿六日飛申，日內拟爲送別，並拟偕訪志賀直哉，彼頗有意於此長住，以家累未果，此去回上海，生活當仍清苦，雖然每月所入約有準備券兩万也。茶の本序文承允執筆，曷勝榮幸。下月初拟將全稿交去，能稍提早見寄，至所願也。〔方纪生翻译了冈仓天心的《茶之书》，于1944年由东京国际文化振兴会出版。受方纪生委托，周作人曾于同年11月20日为该书作序〕

友人多勸搬家，曾登廣告而無結果，乃前數日林美芙子派其夫手塚綠敏〔1902-1989，画家〕來，云拟赴田舍小住，將以其留守宅之半見借，乃於星期日訪之，地在淀橋區下落合，環境頗佳，庭院清廣，屋後有山，山有松林，足資遊息，故決於下月遷赴，如承賜諭，乞暫寄辦事處，一俟遷去，再以奉聞也。前得李曼茵君信，知平白〔尤炳圻〕赴申，未知已歸來否？南方生活較北京何如，或不像北方百物之昂貴乎？周化人君〔1903-1976，南京国民政府要人之一。1939年8月末，在“纯正国民党六中全会”上成为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在汪兆铭政府历任要职。写信当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來函囑待一遊，終無機會，今夏倘能歸去，甚願一行。

啓无〔沈启无，1902-1969，“伪”北京大学教授，曾出席第一、二次大东文学者大会。1944年2月，周作人对其发表了“破门”声明。〕及其一派恐久必失敗，陶君言，南中諸人于其行徑亦極不謂然也。匆匆奉稟，恭仰崇安不備。

紀生頓首上 二月十五日²²

22 1944年2月15日方纪生写给周作人的信参见本文末尾【附录】。

(B) 方纪生寄给周作人的信 (1944年9月28日)

知叟尊鑒：上原氏渡華，諒曾拜謁，紀念冊由其代呈數冊，想亦蒙哂存矣。一般販賣者下月初旬發行，有書匣者百冊，容再設法奉寄。此書印刷尚佳，友人得之者均驚嘆，唯校對仍不甚盡善，畧有錯字，乃美中不足，又佐藤春夫文中稻公〔钱稻孙、1887-1966。这时，“伪”北京大学本部秘书长〕學歷並未誤記，因一時不加注意，擅加指摘，擬設法訂正之。

昨得家嚴函，言某公示意稻公辭職，仍由本人自兼，知之甚為憤慨，其用意何在，令人莫明其妙，豈欲一手包辦一切耶？

文學者大會〔从1942年至44年共召开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里指的是第三次〕似決定開會，此間報紙曾出專號，前數日東京新聞又發一消息，提及叟將赴會，當是無根的推測而已。又言武者先生亦將西行〔指参加东亚文学者大会〕，亦不一定可靠。〔应该是指文学报国会在9月1日的《日本学艺新闻》上发表的“招待候补者”名单中的“中华民国”预定代表。排在第一位的预定代表是周作人。但周作人并未有参加〕武者先生於十九日赴京都，明後天始能歸來，故紀念冊尚未呈去，而祝賀會亦因之延期也。

疏散於信州輕井澤事，因十月一日有留學生抵此，不得不展期，大約十月五日起程，紀生在那裏每月只能小住數日，思之至悵，堀口之妹亦遷在該地，詩人今日來信，已与之約好，將來互相照顧，彼女与友人共經營一小牧場，有牝牛多頭，據說有分喫牛奶希望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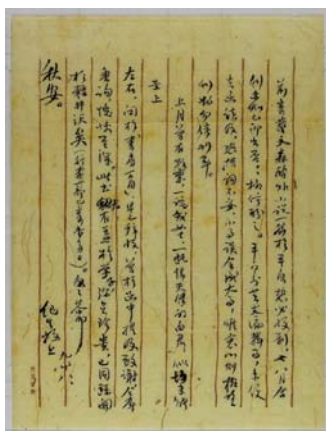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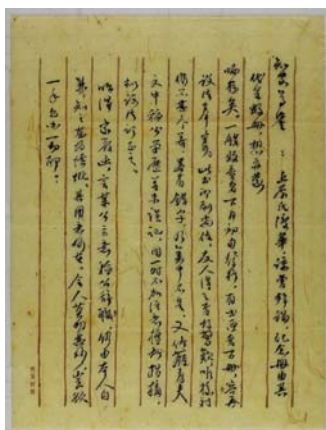
前寄藝文森鷗外小說一篇於平白，想必收到，七八月合刊未知已印出否？極佇盼之。平白與藝文〔以中国文化振兴会为基础的组织“艺文社”的杂志〕に編輯事，未便去函談及，恐措詞不妥，小事誤會成大事，唯衷心則極望刊物勿停刊耳。

上月曾有數稟，一託〔应该是“托”〕戎女士，一托歸天津的白君，似均未能呈上左右，關於「書房一角」〔1944年5月发行〕，早已拜收，曾於函中提及致謝，今辱垂詢，愧悚至深，此書尤有益於學子，彌足珍貴，已同疎聞於輕井澤

矣（行李一部已寄去多日）。匆匆恭仰

秋安。纪生敬上 九、廿八、²³

*关于“上原氏”、“戎女士”、“白君”，笔者未能查明具体是谁。有兴趣的烦请自己调查。



【照片 10】方纪生给周作人的书简 B（1944 年 9 月 28 日）

23 1944 年 9 月 28 日方纪生写给周作人的信。

3. 新发现的两件周作人的亲笔原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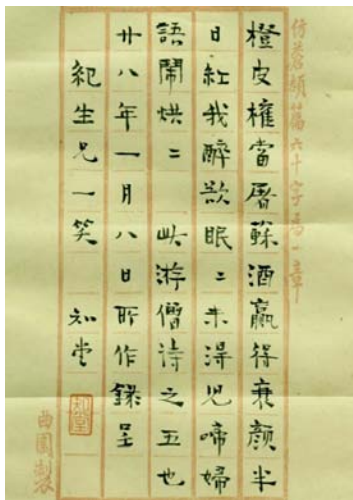
川边比奈·鸟谷真由美

《周作人先生的事》中收录的《周先生的点点滴滴》原本是方纪生第一次寄给改造社的《大陆》5月号（昭和16年5月1日发行）中以《周作人先生的点点滴滴》为题的文章。在收入《周作人先生的事》时仅将题目稍做了修改。方纪生在该文中称周作人为“生活艺术家”，介绍了曾刊登在《语丝》创刊号的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上下身》、《自己的文章》等文章，讨论了周作人的具有艺术性的文章观。而且，引用“在过去两三千年的才士群里，几乎尚找不到相当的配偶呢”这一出自钟敬文的评价，来称赞周作人的小品文，同时还提及《儿歌之研究》，称赞“周先生在民俗研究方面也可以堪称是中国唯一的先觉者”。

方纪生还论及了周作人的人品和“淡泊悠闲”的处世态度，称其文章“敬仰平淡自然的境界”。方纪生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讨论这一点，并且介绍了周作人的三首诗。关于这三首诗，方纪生表示，第一首是1943年12月7日寄给方纪生的

《偶成》三首中的《其二》，第二首是1939年1月周作人狙击事件发生数日后写下的《游僧诗几首》中的一首，第三首则是写于1939年4月23日的名为《遣怀用六松老人的原韵》的一首律诗，而这三首诗都是周作人直接寄给他的。在《周先生的点点滴滴》一文中，方纪生刊登了这三首诗的日语译文，并且还提到了作诗的背景。

这次在川边比奈的家中发现了上述三首中的第二首（A）和第三首（B）的周作人亲笔中文稿。本文附上了诗稿的照片和在参考该书方纪生的译文（划线部分，下同）基础



【照片11】周作人的亲笔稿件 A

上翻译的日文。

(A)

橙皮權當屠蘇酒贏得衰顔半

日紅我醉欲眠々未得児啼婦

語鬧烘々此游僧詩之五也

廿八年一月八日所作錄呈

紀生兄一笑 知堂²⁴

(橙皮を假りに屠蘇酒に當て留め得たり衰顔半日の閑 *1

我酔ひて眠らんと欲するも眠り得ず児は啼き

婦は語り鬧ぎ烘々。此れ游僧詩の五なり。

二十八年一月八日作る所を録し、紀生兄に一笑を呈す。 知堂)

*1 原文不是“閑”，而是“紅”。

(B)

遣懷用六松老人原韻

苦茶啜盡不成眠挑擔何時得息肩漫

顧破甌談往事且傾濁酒送餘年未能

泯默居牛後幾至倉皇死馬前差喜如

今都忍過思量身世渺雲煙

廿八年四月廿三日作三十日晚

大風中於蠟燭下錄寄

紀生兄以博一笑 知堂²⁵

(遣懷 六松老人の原韻を用ゐる *1

24 1939年1月周作人狙击事件发生数日后写下的《游僧诗几首》中的一首。

25 这首是写于1939年4月23日的名为《遣怀用六松老人的原韵》的一首律诗。

苦茶啜り盡して眠りをなさず、
 桃擔 *2 いづれの時か肩の息まるを得ん、
 漫りに破甑を顧みて往時を談じ、
 かつ *3 濁酒を傾けて餘年を送る、
 未だ泯滅 *4 する能はずして牛後にをり、
 ほとんど倉皇、馬前に死するに至れり、*5
 差喜す如今すべて忍過せるを、
 思量す身世の渺として雲煙なるを。

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作る。三十日の晩

大風中に蠟燭の下にて録し、

紀生兄に寄せて以て一笑^かを博う。 知堂)

- *1. 題目“遣怀”的意思是，用汤尔和的原韵创做的诗。“六松”指的是，周作人的前任原教育总署督办的汤尔和。汤于1940年11月逝世，第二年周就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
- *2. 原文不是“桃”，而是“挑”。
- *3. 方纪生把它译成“かつ”（且），可是这大概是“いささか”（略）的意思。
- *4. 消失之意。原文不是“灭”，而是“默”。
- *5. 指1939年元旦发生的周作人狙击事件。



【照片12】周作人的亲笔稿B《遣怀用六松老人原韵》

结语

鸟谷真由美

本文根据发掘的有关方纪生的史料，介绍了他的一生和他从事的主要活动。通过本文不仅可以了解到《周作人先生的事》一书编辑的真实情况，还可以窥见方纪生的人生与周作人的交流以及与日本的不解之缘。

在中国，人们没有对方纪生给予关注的最大原因应该是，他与被毛泽东点名批判为“汉奸”文人周作人的关系——即使在现代中国，周作人仍是被忌讳的。方纪生自己并没有从事创作，但在周作人的影响下，他酷爱日本文学和文化，翻译了相关书籍和评论。1960年代，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文学系工作期间，方纪生曾着手多项翻译活动，然而当时整个社会被厌日氛围所笼罩，最终那些作品都没能见到天日。此间，担任文学系外国文学组组长的方纪生的许多部下都获得了提升，而方纪生却一直停留在讲师的职位。这应该是他与周作人以及日本有关联的缘故吧。周作人与日本因素已经在方纪生的人生深处扎了根。

而在日本，作为《周作人先生的事》的编者，方纪生的名字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逐渐忘却，之后又随着该书影印版的出版而一度有所恢复。川边女士在中国文艺研究会夏季集训时回忆方纪生也是在那一年。之后，在有关周作人和赴日留学生的研究中，虽然很有限，方纪生的名字开始逐渐被提及。但是，拥有被神秘面纱包围的经历的方纪生并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了解方纪生的日本文士友人早已不在人世，方纪生有着在战争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两次入狱的经历，有关他的记录基本上没有留下来。这也许是由于人们对于“负面遗产”的忌讳心理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方纪生自身也很少讲述自己，这除了他沉默寡言的性格之外，应该还与他那波澜万丈的人生经历有关，但不能确定他的真实意图。总之，如前所述，至今方纪生这一历史人物仍未被放在聚光灯下。

当初开始调查方纪生的时候，笔者完全没想到会在方家发现如此大量的关于

方纪生、周作人以及日本文学家的史料。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介绍了其中有一定证据而且各种手续都已经完成的一部分。但是那些史料都如同忘记了转动的时钟一样，不仅展示了方纪生这个人物，还雄辩地讲述着他进行的多种中日交流活动，以及周作人与日本文学家们之间的交流。方纪生既是支撑了近代中日交流历程的人物，同时也是实实在在活跃在这一历程“周边”的人物。因时间和能力所限，这次对资料的调查仍不够充分，不得不停留在以公开资料为主的程度。关于本文公开的资料，如有兴趣的人能作进一步调查，那将是笔者的莫大欣慰。今后笔者将继续尽力发掘方纪生的史料，希望能够为阐明中日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提供一点帮助。

(二) 方纪生 简历²⁶

- 1908年8月6日 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
- 1920年 经汕头移居北京，编入汇文小学。
- 1925年 汇文中学毕业，考入中国大学预科班
- 1931年7月 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
- 留学日本，明治大学高等研究科入学。
- 1934年4月 明治大学高等研究科修业
- 1934年 回国后，在北京华北大学任教，第一次开设“民俗学”讲座，同时教授欧洲经济史
- 1936年5月 与胡适、周作人、顾颉刚等人参加风谣学会成立大会，与徐芳一同负责会议记录。
- 1936年12月 受罗隆基约请，担任《北平晨报》副刊《风雨谈》的主编。
- 1937年3月 接任《中央日报》的《民风周刊》（风谣学会期刊）的编辑。
- 1938年11月 担任东方书店的文学杂志《朔风》的主编。

26 川边和鸟谷在方纪生本人制作的记录其“略历”的笔记，以及中国文艺研究会夏季集训时的口头报告的基础上，补充了调查内容制作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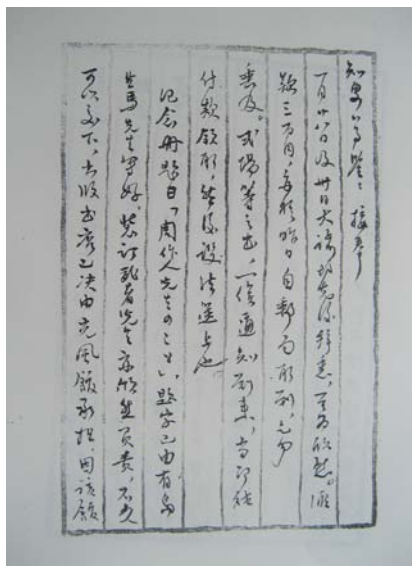
- 1939年 受周作人约请，在北京大学任外聘讲师，教授“文学概论”。
- 1940年3月 受傀儡政府教育总署之命，担任“驻日办理留学事务专员”，带领华北政务委员会管辖之下的留学生赴日（东京），直到日本战败。
- 1941年4月 受仓石武四郎约请，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教授“现代中国文学史”和“宋代词选”（直到1943年为止）。
- 1942年6月 与川边爱子结婚
- 1944年9月 获得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合作，编辑《周作人先生的事》，由光风馆出版。
- 1945年10月 被美国占领军（联合国军）逮捕，之后被遣送至南京。
- 1949年1月 与周作人同时获释出狱，迎接上海解放。
- 1949年9月 回到北京，在新政府的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
- 1954年 担任河北师范学院中文学部讲师。
- 1968年9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与妻子一同被拘留在北京半步桥监狱。
- 1975年7月 获释出狱。
- 1979年3月 恢复名誉。
- 1980年4月 为陪同妻子回国探亲和治病疗养前往日本，暂住东京。
- 1982年5月 作为京都大学招聘外国人学者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从事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
- 1983年1月 因肺炎在京都大学胸部结核研究所附属病院住院。
- 1983年6月 去世，享年74岁。

参考书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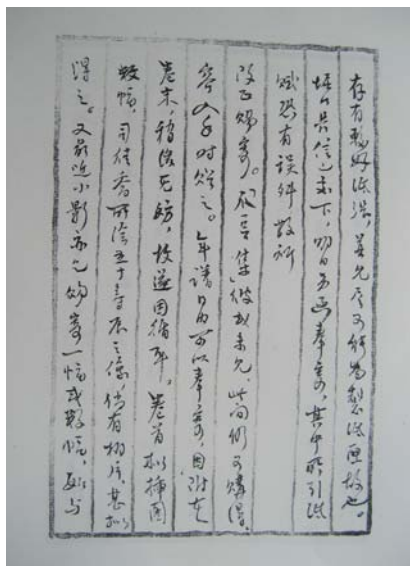
- 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こと》光风馆，1944年（方纪生编《周作人先生的こと 伝記・周作人》（传记丛书187）大空社，1995年）
- 东亚问题调查会编《最新支那要人伝》朝日新闻社，1941年
- 《知堂回忆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1970年
- 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記》筑摩书房，1978年（木山英雄《周作人＜対日協力＞の顛末——補注《北京苦住庵記》ならびに後日編》岩波书店，2004年）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编《民俗学概论》（民俗学资料丛刊）1980年
- 《華味三昧：中国料理の文化と歴史》讲谈社，1981年
- 伊藤虎丸编《駱駝草 附駱駝》亚洲出版社，1982年
- 张香菊、张铁荣编《周作人研究资料》（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
- 鲍耀明编《周作人印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
- 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本文参阅2013年（增订）版。
- 松冈俊裕《1941年周作人訪日歓迎会寄書考（稿）一星ヶ丘茶寮での日中文人の交流》《东方》229号，2000年，8-12页。
- 木山英雄《林芙美子遺品中の周作人書簡》周作人研究会《周作人通信》3号，2015年（电子版）

【附录】：方纪生给周作人的书简A（1944年2月15日）详见本文第2-2节编辑秘话（初次公开）

第1葉



第2葉



第 3 叶

我弟今到，照的各位，似亦不妨到也。蘇村原有
 是即后而，仿由依令可其屋照相，州附入無中
 起为好况，多如
 何以不能否？
 由元他界近常允，已决幸月廿六日就中，日如如为
 送别，董如僧竹去破古哉，彼能者去於此以信
 以心累未采，此苦回上海，生後常仍清安，船是而
 月所入信有半備着萬也。苦之存，在文也

第 4 叶

先執筆，是勝等幸，不自如如得令指定去候
 得獲命允身，已所解也。
 友人多初擬亦，曾登應音而充信集，仍前數
 日林美子派其夫手攝係就來，云如想田居少信
 將以其留皆定，幸允借，乃於星期日訪之，地是
 濱跨山下落舍，隱隱款信，庭尚清幽，屋山有
 山，山有杉林，且遠遊息，故决於下月遷赴，如所始
 流，元新多多如子處，一後遷去，再以奉

第 5 叶

謝也。若信未安前及後，亦平自赴中，幸知已得
 去否？南方生信移地幸何如，或不係地方否信之
 口印甚多，周化人房其出信行一遊，信免机念，今夏
 信解接去，甚毅一行。
 研元及苦一師然必失致，陶君定，南中端人于
 其行信，再相不謂其也，多：厚，而，幸印
 業安不備。
 信，好首上
 二月廿五日